

全球智库半月谈

新晋诺奖得主 Tirole 的贡献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 100 年

全球失衡是否得以改善？

量化宽松的分配效应

GDP 误导中美经济实力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

本期编译

高 歌

郭子睿

黄杨荔

黄懿杰

李 想

刘天培

刘兴坤

沈仲凯

苏 丹

许平祥

杨 原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新晋诺奖得主 Tirole 的贡献 4

导读：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法国经济学家 Jean Tirole，以表彰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他的贡献超越了典型的模型建立，也不仅限于创建可靠的分析工具。他的不少重要论文在竞争策略和市场监管领域有着深远影响。以下选取了他在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中的部分基础贡献。当然，本篇短文远远不能包含 Tirole 的所有贡献。

奥巴马的亚太外交之旅 7

导读：奥巴马于11月9日展开亚太之旅，将先后访问北京、缅甸和澳大利亚，并分别参加 APEC 峰会、AES 和 G20 峰会。此次亚太之旅对其外交政策意义极为重要，预示着“再平衡”政策的命运以及对外交风格转变的检验。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 100 年 9

导读：本文基于币种、期限结构、流动性、持有者四个角度，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1990-2011年的债务结构。虽然数据存在缺陷，仍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全球治理

全球失衡是否得以改善？ 11

导读：过去八年中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有了一定改善，相应的系统性风险也有所下降。但本文强调，尽管总体情况有所改观，但净债权、债务国家的分化情况确实越发严重，此外一些大的债务国仍面临市场信心崩塌的危险。未来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必须在需求面有一次全球性调整。

TPP 缺失的要素 13

导读：在 TPP 协议中增加关于限制汇率操纵的条款将有利于通过 TPP。而且考虑到目前美国的两党竞争、财政部状况以及世界较大的经济体的现实情况，限制汇率操纵能够帮助达成共识。

经济政策

资本流动：双管齐下 14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显示出很强波动性。因此，是否需要

更好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重新得到了广泛讨论。本文作者测度了在流出国和流入国同时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对于驯服不稳定资本流动的作用。他们的结果表明，单边或双边的资本账户管制能够显著减少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

量化宽松的分配效应 18

导读：超低利率和央行的资产购买行为刺激了资产价格，富人是主要的受益者。尽管关于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的讨论已是老调重弹，然而，在不平等性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使用面前，这一话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聚焦中国

中国土豪在欧洲掘金 21

导读：随着 2010 年欧债危机爆发，中国调整了海外投资重点，将重心集中在陷入困境中的欧洲，并利用这种百年一遇的机遇，开始收购世界级的品牌，入股关键性的国家基础设施资产。

2016 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策略 23

导读：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WTO 将不再允许美国在反倾销行动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人们不禁质疑，非经济政策手段将从此悄然消失吗？本文认为，美国的最优选择是尽早废除“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策略，这既符合 WTO 规则，又会降低对本国经济的扭曲效应。

GDP 误导中美经济实力 25

导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做出预测，认为中国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 GDP 规模将在 2014 年超过美国。本文作者分别从购买力平价方法、GDP 指标以及国家财富三个层面驳斥了这一观点。

战略观察

反思美国的对“伊斯兰国”战略 27

导读：受美国人斩首事件的刺激，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斯兰国”战略开始变得趋于强硬且更加投入。本文的作者对现有战略过度倚重军事手段的做法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并给出了补充性的政策建议。

11 月亚太地区国际峰会政策前瞻 30

导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峰会将于 11 月在亚太地区集中召开。这些峰会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何意义，奥巴马将如何利用参加这些峰会的机会来推动其亚太外交政策，本文的两位作者给出了自己

的分析和预判。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 32

导读：2014年10月8日，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网站上发表题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的文章，文章对10月8日发布的关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强调了加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本期智库介绍 34

新晋诺奖得主 Tirole 的贡献

Francesco Salemi/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法国经济学家 Jean Tirole,以表彰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他的贡献超越了典型的模型建立,也不仅限于创建可靠的分析工具。他的不少重要论文在竞争策略和市场监管领域有着深远影响。以下选取了他在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中的部分基础贡献。当然,本篇短文远远不能包含 Tirole 的所有贡献。编译如下:

1、反竞争的纵向合并与限制

在 Tirole 与 Hart 于 1990 年合作的长达 82 页的论文中, Tirole 构建的模型说明了纵向合并与限制将导致市场止赎。不同于芝加哥学派的主流观点认为,止赎是一种非理性决策,并将收益与协同效应看作纵向尝试唯一的激励; Tirole 指出,如果协议是秘密进行的,抑或能够被秘密改动,那么供给者将丧失与零售商作出联合承诺的能力,进而降低其市场能力,难以将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为了理解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个供应商面临数家零售商的情况,并假设不存在需求不确定性,因而二者不会对预期收益提出异议。供应商可以对某一家零售商作出排他性承诺,从而换取一定比例的利润;然而,由于这个承诺不具有约束性,供应商会有违约动机,投机性地与另一零售商达成协议,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当然,这种不具有约束性的承诺也意味着供应商有动机重复违约。然而,一旦对供应商这种行为进行预期,零售商将不会接受其供应,从而使供应商丧失其市场潜力。纵向合并可以合法地约束这种排他性条约,抑或维持零售价格,这使得上下游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实现有机的结合,从而维持了其市场能力。

2、多边平台

所谓多边平台是指处理超过两组消费者的中介媒介,它使得不同阵营的消费者对其他阵营的参与作出评估。

与零售商这类中介不同,多边平台是对不同主体的交互作用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消费群体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任一消费者能够从其他群体的参与中获得收益,因为这种参与代表了能够进行交互的可能性。以支付卡为例。它使消费者能够在各商家进行购物而免去带现金的麻烦,这其中的良性循环就在于:只要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支付卡,消费者对持有支付卡的效益评估就越高,这又会使得更多的商家愿意安装读卡机,如此循环。

消费者群体在不同需求间存在相互依赖性,这通常会导致一个倾斜的价格结构,即有一方会承担损失以吸引另一方消费者,平台也由此获利。这意味着不能

单独割裂地来分析任意一方，否则权力机构就会因为过度定价而错误地惩罚这一平台。

3、“专利池”与合作协定

在 2004 年与 Lerner 合作的一篇论文中，Tirole 研究了“专利池”这一问题，即关于专利拥有者达成联合协议以形成一个共同的专利许可。他率先意识到，专利的替代性和互补性依赖于其当期专利费。当专利费较高，专利权将倾向于具有替代性，因为使用专利的人可能只是想使用专利池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专利之间形成竞争。此时，专利费的上升将引起某些专利脱离专利池。相反地，当专利费较低，专利权倾向于具有互补性，潜在的专利使用者将运用每一个专利（取决于技术的利用）。此时，专利费的提高会导致对整个“专利池”需求的下降，但不会引起专利脱离专利池。在这种情况下，专利池提高了社会福利。

决定一些专利是互补品还是替代品，这一问题在现实中比较微妙，原因在于权力机构可能对“专利池”的需求不具有完全信息。然而，Tirole 意识到，如果许可的拥有者同时能够提供单一的专利许可，权力机构就能够筛选出不具备“反竞争”风险的专利池，因为许可拥有者只有在专利池价格更高时才会提供这种单一许可。

尽管这一论文讨论的是“专利池”问题，并且与时下的讨论息息相关，但是它的分析具有一般性和应用性。加上一些必要的修改，这就可以引申至合作协定的问题，例如航空公司之间的代码共享条约。

4、对自然垄断的监管

Tirole 的另一大贡献就在于监管领域。他与 Jean-Jacques Laffont 一道于 1986 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在文中，他分析了在如下情形中对垄断者的监管：管制者尽管能够考察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企业对决定成本的因素拥有信息，这使得管制者无法区分一家因规模经济而有效率的企业与一家因积极投资而有效率的企业之间的差异。

在这一情形中，他们发现，因为在管制者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管制者无法取得一个最优的结果，但能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合约来达到一个次优的结果。如此，企业就会自己选择一个合约并报出其期望成本，从而最小化垄断利润，并使企业仍然有动力去削减成本。在这一系列的条约中，一般包括固定租金加上一个超额成本退还的线性组合，从而给予企业很强的动机去削减成本。对于最有效率的企业，合约应仅包括固定租金，从而使其有降低成本的动机；针对经济效率不那么高的企业，合约通常仅包括超额成本退还，从而降低信息成本。事实上，如果考虑给予低效率企业一个固定租金的条约，以激励它们削减成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低效率企业，就应当将固定租金定得更高一些。然而，一家高效的

企业可能会有动机报告一个较高的期望成本，从而获取更大的租金并赚取额外的信息租金。因此，管制者的这一系列条约实际上就是在激励企业削减成本和对高效企业的信息租金之间作出权衡。

Laffont 和 Tirole 还将这一模型进行延伸，不仅局限于对一次性管制的考虑，还将其纳入到一个管制过程中。同时，Tirole 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也不仅局限于构建管制博弈的一般模型，还处理了在诸如信息交流、金融部门等特定产业中的管制问题。

本文原题为“Jean Tirole's legacy”。本文作者 Francesco Salemi 为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的科研助理。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奥巴马的亚太外交之旅

Matthew P. Goodman/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奥巴马于 11 月 9 日展开亚太之旅，将先后访问北京、缅甸和澳大利亚，并分别参加 APEC 峰会、AES 和 G20 峰会。此次亚太之旅对其外交政策意义极为重要，预示着“再平衡”政策的命运以及对外交风格转变的检验。编译如下：

向来美国总统的每次出访都意义非凡，然而 11 月份奥巴马的亚太之旅则是极为重要。在中期选举的随后几天，奥巴马将访问中国、缅甸和澳大利亚，这是巩固其外交政策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此行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有可能预示着奥巴马亚洲“再平衡”策略的命运；其次是奥巴马的外交风格转向联盟构建的尝试和检验。

奥巴马的第一站是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将访问缅甸，并参加东亚峰会(EAS)。最后，奥巴马将访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亚洲再平衡策略在 2011 年首次提出时，赢得了美国两党的高度赞扬；然而，随后的实施过程中却存在两大漏洞，遭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一是奥巴马没有出席之前两次 APEC 会议和去年的东亚峰会(EAS)；其二是美国在亚太的经济政策取得的进展极为有限。第一个漏洞可以通过奥巴马参加随后的亚太高级别会议修补。然而，填补第二个漏洞极为困难，这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能够完成跨太平洋合作伙伴 (TPP) 贸易谈判和是否能成功与中国形成经济战略关系。

再平衡策略的成功取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诸多方面的实质性实施，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TPP 是美国政府参与经济领域的重要载体，如果 TPP 无法取得进展，再平衡策略将是跛足的，甚至有可能起到反面作用。反过来，TPP 的成功将巩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如果没有美日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犹豫，TPP 已经几乎完成。关闭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接近，但东京和华盛顿在 TPP 领导人会议之前达成一致，还留余微弱希望。考虑到再平衡策略和他的宏大外交，奥巴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说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农产品市场做出让步。当然，奥巴马也需要公开的承诺在中期选举之后促使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权 (TPA) 法案。

然而，即使 TPP 完成，奥巴马亚洲的经济策略中仍然留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中美关系。美国和中国经济纽带让双方在过去 35 年取得了互利共赢，并为未来双边全面合作关系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但是，这条纽带在美国声称的网络间谍、知识产权剽窃以及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此外，自从十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北京和华盛顿在双边关系中

就无暇于形成大规模经济协议。在北京，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到他们最高级别的议程上来。二位领导人应该就有利于未来长期更深入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在开放、透明和高标准方面取得一致。特别的，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推动中美从双边投资协定(BIT)过渡到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并最终实现自贸区(FTA)；由此，把中国纳入到 TPP，以便更快的在不远的将来形成 APEC 所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除了实质性条件之外，亚太之旅将测试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另一维度：外交政策风格的转变。这就是广为嘲笑的“背后领导”策略，即美国在全球事务上放弃传统的领导地位，退居二线。但是，正如 CSIS 主席 John Hamre 所认为，全球大多数具有挑战性的事务，从埃博拉到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得到解决；美国把各国联合在一起，并让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由此实现“内部领导”。

这正是奥巴马于 2009 年决定采用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并在两年后参加 EAS 的背后逻辑。G20 峰会在早些时间就全球金融危机采取协同行动取得了成功，这在某种程度确认了该方式的可行性。同样，美国总统在 2011 年巴厘岛的东亚峰会（EAS）的出席，就促成了该地区海事安全和防核扩散标准的达成。如果仅凭这些国家（东盟 10 国+6 国）内部讨论，是无法取得这些成果的。但是，在 G20 和 EAS 的情形中，近期的峰会开始失去动力。若“内部领导”是奥巴马希望外交政策的方式，他应该以此次缅甸和澳大利亚之行为契机，在安全和经济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内比都，奥巴马应该促使 EAS 领导者签署海域信任建设措施和宣布承诺共同应对全区域的挑战，包括从传染病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广泛议题。在布里斯班，他应该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包括 G20 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结构性改革，推进全球贸易谈判议程和国际税收合作。

奥巴马总统忙于在国际舞台上燃烧几把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大多数问题，遏制它们可能是他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一个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来得重要，这取决于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能否成功，以及唤起国际合作的努力程度。

本文原题为“Obama’s legacy tour”。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 100 年

S. M. Ali Abbas, Laura Blattner, Mark De Broeck等/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基于币种、期限结构、流动性、持有者四个角度，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1990-2011年的债务结构。虽然数据存在缺陷，仍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编译如下：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政界及市场人士都对主权债务充满兴趣。本文认为，主权债务的结构对于债务的可持续性、最优税收制度、货币政策及金融管制等方面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分别从以下四个角度研究了主权债务的结构：币种（国外或本国）、期限结构（短期或中长期）、流动性与持有者（非居民、国家中央银行、国内商业银行和其他）。然而，研究长时段主权债务结构的最大障碍是数据缺失。作者搜集了 13 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1900-2011 年的债务数据结构。由于这是第一次尝试，作者指出了其所使用数据的缺陷，如某些类型或某一时期债务数据的缺失（如二战前后）。尽管存在缺陷，这些数据仍能为我们深入分析过去 100 年来发达国家的债务结构提供一条途径。

1、历史债务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发达经济体中，约 90% 的债务为本币债务。其中，有 6 个国家的外币债务占比曾超过 50%，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最为显著。

本币债务中，中长期期限债务约占 68%，说明政府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发行中长期债券，在萧条时期通过缩短债务期限降低风险。不同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大致相似，除非某些国家遭受了财政或军事危机。

一战前，几乎所有中央政府的债务均以可流通证券的形式发行。一战后可流通证券的份额开始下降，在二战后的金融抑制时期最低降至 55%。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可流通证券的份额才开始增加，目前约占 80% 左右。

中央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约占 10%，国内商业银行约占 20%。20 世纪 70 年代后，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飙升，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同步下跌。1970-2011 年，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从 5% 升至 35%，反映出一系列潜在因素：金融创新和全球化；对主权债务管理的加强，独立的中央银行致力于降低通胀；欧元引入导致欧元区内部汇率风险的消除，以及逐渐积累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安全证券。

2、债务削减意味着什么

过去，政府主要使用两种策略降低债务：第一种为传统策略，包括保护长期债务，整顿财政，某些情况下采取温和的通货膨胀（今天看来已经很高）；第二种则是非传统策略，主要依靠垄断金融投资者持有债务，伴随一定的高通胀，以

减少短期债务。考虑到目前经济的低增长率以及财政调整面临的压力，非传统策略似乎难以实行。

表 1 主权债务的构成

	Debt/GDP	Marketable	Domestic MLT	Domestic ST
End of WWII	172	71	69	30
End of Great Recession	98	81	83	17
	Central bank	Com banks	Non-residents	Non-bank dom
End of WWII	12	34	3	51
End of Great Recession	9	12	36	44

作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满足实施非传统策略的条件，如缺乏资本账户管制，缺少竞争性的投资机会。而且，非居民持有债务比例高达 36%（二战结束时为 3%），国内银行系统持有债务份额仅占 21%（二战结束时 46%），很难为债务持有者提供可持续的回报。

同样，通过实施高于央行通货膨胀目标的意外通货膨胀以贬低已发行的中长期证券价值，也会面临一系列挑战：第一，目前的低通胀环境很难实施意外的通货膨胀措施；第二，全球接受的稳定价格机制不允许实施意外的通货膨胀措施；第三，一旦实现了高通胀，再回到低通胀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第四，如果债务可持续或是低风险的，采取高通胀政策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

2、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的意义

主权债务的管理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模型来分析这种变化。比如，一战前，主权债务管理主要服务于某一项特殊的需要或目的，如为一战融资；一战后，主权债务管理主要通过金融抑制和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债务的 GDP 占比；最近几十年，债务管理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在于降低未来债务的偿还成本，将其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债务结构是否有助于预测危机，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直觉分析的结果是：债务结构变化可能会增加危机的风险，如缩短债务期限。同样，如果债务持有者主要为非居民而非本国投资者，那么，政府的违约意愿也会有所不同。

本文原题为“A 100-year perspective on sovereign debt composition in 13 advanced economies”。本文作者 Ali Abbas, Laura, Mark, Asmaa 为 IMF 经济学家, Malin Hu 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失衡是否得以改善？

Aqib Aslam, Samya Beidas-Strom, Marco E Terrones, Juan Y ópez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过去八年中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有了一定改善，相应的系统性风险也有所下降。但本文强调，尽管总体情况有所改观，但净债权、债务国家的分化情况确实越发严重，此外一些大的债务国仍面临市场信心崩塌的危险。未来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必须在需求面有一次全球性调整。编译如下：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在 2006 年达到顶峰，在此后八年中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程度改善，并且现在看来这一向好趋势预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全球失衡问题在流量层面的好转依旧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存量层面看，失衡问题仍在进一步恶化。目前一些大的净债务国仍面临由市场信心丧失和利率上升带来的可能风险。未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需要在需求面有一次全球性的调整。

2006 年是全球失衡问题最为严重的一年，当时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表示了极大担忧，尤其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些巨额赤字国。当时各界普遍担心，随着美国巨额债务的不断增长，极有可能导致市场信心丧失和融资来源中断，进而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冲击。

1、全球失衡问题在流量上的改善

八年时间过去了，从可喜的一面来看，全球失衡问题（以流量计算）已经下降近 1/3。这些变化背后伴随的是净债权、债务在各国间分布的巨大变化：经常账户赤字率排名前十的国家的赤字总和已经减少一半（占世界 GDP 比例），而相应盈余前十位国家的总和盈余也下降了 1/4。总体上看赤字的分布变得相对分散，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之前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美、日美失衡问题也有了极大改观——美国已经成功削减超过一半的赤字。

从上述这些改变来看，2013 年全球失衡问题在结构上似乎比 2006 年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考虑到相应的系统性风险也随之下降，由此我们提出两个相关的问题：1) 近期观察到的全球失衡改善迹象是否可以持续？ 2) 当前新的全球失衡格局是否仍需警惕？

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主要净债券、债务国是如何调整以缓解失衡问题的。

2、失衡问题的流量调整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经常账户调整主要有两种方式：1) 支出总量的调整 2) 在本国和国外商品、服务支出上的结构性调整。前者主要是通过本国相对需求的改变来实现的，而后者则主要经由实际汇率调整完成，而实际汇率往往又是通过影

响投资意愿来起作用的。这两种方式都将对外部（经常账户）和内部（失业及产出缺口）平衡产生极大影响。

我们研究发现，最近的全球失衡调整更多是由于危机过后赤字国大幅减少支出导致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进口的显著下降。相比之下，实际汇率调整对失衡的改善作用则要小一些。正是由于此次调整主要是由支出减少带来的，可以想见各经济体必然面临高昂的调整成本，主要表现为失业率高企和产出缺口扩大。一个自然的推论则是未来随着各国经济复苏和产出缺口缩小，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可能再一次加剧，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此番向好局面的可持续性。

3、失衡问题在存量上的扩大

对比 2006 年和 2013 年净债务和债权排名前十的国家名单，可以发现两者的重合度很高——这说明从存量上来看，失衡问题在国家间的分布有很强持续性，另一个趋势是失衡问题更多地集中到了净债务方。过去几年中，对于一些有赤字的发达国家而言，外债比例不断攀升部分归因于名义 GDP 增长缓慢。

4、未来全球失衡问题前景如何？

未来全球失衡问题将在流量上有进一步改善，基于这一判断，未来经常账户和净外国资产头寸的状况将有所好转，进而增强全球外部环境的稳定性。

尽管如此，但必须认识到目前部分盈余及赤字国的外部失衡状况依旧超出基本面所预测的合意水平，并且在存量上的失衡仍将进一步扩大。举例来说，一些欧洲经济体及部分石油出口国盈余水平依旧居高不下，一些原材料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经常账户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并且这些经济体仍面临由市场信心和利率突然飙升带来的可能冲击。与此同时，几个大的欧洲赤字国仍在经历痛苦的外部调整过程。在中期来看，不仅是一些大的债务国，还有部分较小的欧洲经济体和一些易受市场影响的经济体，对于外部环境变化仍十分敏感。

在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方面，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债务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状况，进而缩小失衡规模。外部需求的回暖以及进一步支出结构上的调整都将有助于外部失衡的调整。

本文原题为“Global imbalances: Whither now?”。本文作者 Aqib Aslam, Samya Beidas-Strom, Marco E Terrones, Juan Yépez 均为 IMF 研究部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载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PP 缺失的要素

Simon Johnson/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在TPP协议中增加关于限制汇率操纵的条款将有利于通过TPP。而且考虑到目前美国的两党竞争、财政部状况以及世界较大的经济体的现实情况，限制汇率操纵能够帮助达成共识。编译如下：

一般而言，要达成多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提出的条件越少越好；但是为了提高以美国为核心的 TPP 协定的成功率，可以加入一个限制参与国进行汇率操纵的条款。考虑到目前的现实，限制汇率操纵还有助于克服国际贸易系统长期存在的弊病。

目前，TPP 协定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日本，甚至中国未来也可能加入。虽然前景美好，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存在重要的问题：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操纵汇率来产生过多的顺差。一般来说，顺差使得本国货币有升值的趋势，但是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外国资产进行抵销。最常见的政府持有的资产就是美国政府债券。虽然对美国保持低利率很有利，但是会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汇率操纵，但是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同样，美国财政部也负责判断一些国家是否过分地操纵了汇率，但是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实质的影响。

Bergsten 与 Gagnon 认为，可以通过在 TPP 中包含一个限制汇率操纵的条款解决这个问题。虽然真正的效果可能不太确定，但它能够帮助改变政府的标准与市场预期。

美国官员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 11 月的国会大选肯定会影响最后的政治博弈，但是反对者应当考虑到，美国两党在这个方面一直寻求合作，TPP 就是达成共识的契机。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近年并没有过多操纵汇率，日本则根本没有此类的行动，所以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排斥这个条款，这是个不错的时机。他们可以选择自由浮动或者是固定汇率。只是如果采用固定汇率的话，不能使用一个过于低估的汇率。近年来，操纵汇率的行为已经不能容忍，其对美国产业部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应该意识到，在汇率问题上达成一致能够增强 TPP 的威信。

本文原题为“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s Missing Ingredient”，作者为 Simon Johnson，是 PIIE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资本流动：双管齐下

Atish R Ghosh, Mahvash Saeed Qureshi, Naotaka Sugawara /文 李想/编译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显示出很强波动性。因此，是否需要更好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重新得到了广泛讨论。本文作者测度了在流出国和流入国同时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对于驯服不稳定资本流动的作用。他们的结果表明，单边或双边的资本账户管制能够显著减少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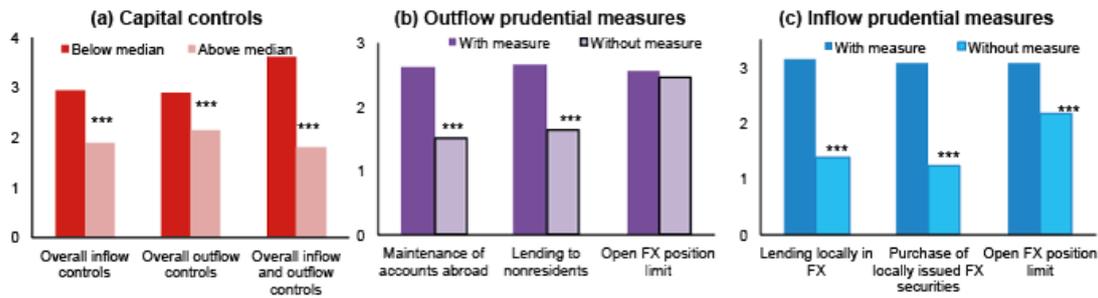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跨境资本流动的涨落周期重燃了关于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管理的争论。尽管大多数文献都聚焦于流入国的政策选择，近期也有一些研究和政策文章呼吁用一种更为协调的方法，即既在流入国也在流出国采取行动来管制资本流动。这种想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实际上，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架构中的议题之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在 1944 年辩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所达成的。

作者近期的一篇文章考察了采用合作方式，即在资本流入国和流出国均实行资本账户管制，来管理潜在的不稳定资本流动的方案。他们分别估计了管制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的所带来的冲击，也估算了二者同时管制的影响。作者使用了 1995 年-2012 年间 31 个流出国流向 76 个主要接收国的双边银行资本流动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当地银行统计数据库。同时，作者将这一信息与这些国家内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管制指标结合在一起，后者由 IMF《汇率制度和汇率管制年度报告》中的信息以及 OECD 资本流动自由化代码构建而成。他们的资本管制范围覆盖了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两方面的相关措施，而且有各个或整体资本类型的管制，同时还包含了类似于资本管制的针对金融部门的特殊措施。

1、资本账户管制有作用吗？

政策协调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资本流出国和接收国所采取的管制措施真的能对资本流动产生作用，但从现有证据看，肯定回答与否定回答兼有。作者首先分别检测了资本流入国与流出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是否会带来跨境银行资本流动规模的减小。如图 1 所示，从数据上的简单关系来看，如果限制了资本流入和流出，双边银行资本流动数量显著更低。类似地，流出国对海外账户和非本国居民借贷的审慎管制，会伴随着从银行流出资本的显著减少。而流入国外汇相关的管制措施（比如对国内外币贷款的限制和开放外币头寸上限）似乎也抑制了资本流入。

图 1 跨境银行资本流动，资本管制与审慎措施，1995-2012 年



注：银行流动以汇率调整后总资产存量的自然对数来记，负数的资本流动取绝对值后再取对数，然后改变符号。***表示两组之间的差距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经过更为正式的实证分析后，这些观察到的结果依然成立。这表明无论是流出国还是流入国的资本账户管制都伴随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显著降低。

- 对于资本流出国而言，无论是对整体资本还是对债券、股票、直接投资或金融信贷，如果资本账户流出的管制加强，金融部门对非本国居民的借贷限制增加，资本流动将缩减 50-100%。
- 对于资本流入国而言，如果对整体资本或者对债券市场流入的管制加强，对外币相关的审慎措施变紧，资本流入将减少 50-80%。

在许多种影响因素中，作者发现全球风险厌恶、流出国的货币政策（用利率来衡量）、流入国的国内利率和汇率对银行资本流动有很强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强化了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

2、双管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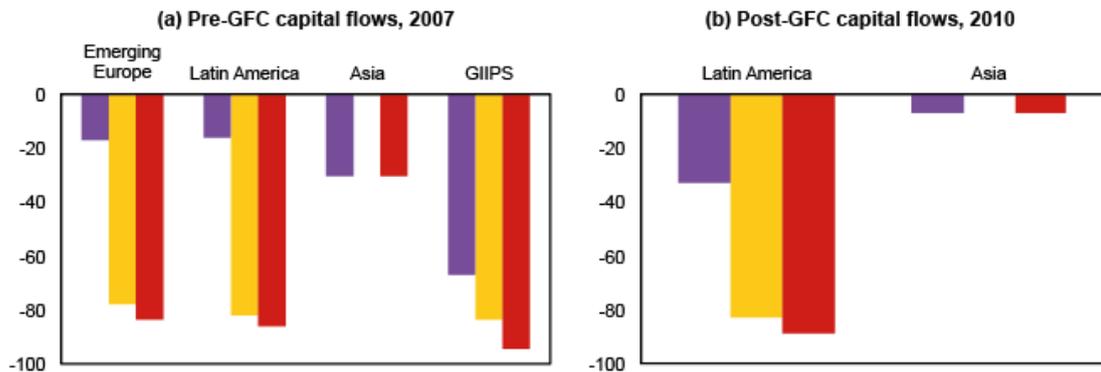
同时管制流出国和流入国的影响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然而，如果另一方的金融部门更为开放（不一定是完全开放），一方单独采取管制措施能带来更大规模的流动缩减。只要资本管制是有效的，这个结果从直觉上很容易理解。如果资本流出国管制了资本出境，那么相比其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流入管制对于资本流动规模的边际影响就更小。与之类似，当资本接收国对流入进行管制时，宗主国对流出的管制所带来的边际影响就更小。因此，流出国和流入国管制的影响可以部分相加，这使得在两边同时进行资本项目限制成为可能，从而在流入上达到更大规模的缩减，或者用更弱的管制措施（扭曲或许更小）来达到相同程度的缩减。

基于以上结果，如果流入国和流出国之中的一方，或者两方同时采取资本管制措施，那么危机前流向新兴欧洲和欧元区边缘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将显著更低。例如，如图 2 所示，如果所有流出国都采取了金融信贷流出管制措施的话，2007

年流向新兴欧洲国家的跨境银行资本数量可能减少 20%；如果所有流入国都对当地的外币贷款进行管制，则可能减少 80%；而如果流入国和流出国同时管制金融信贷和外币借贷，资本流动规模可能缩减 80%。

欧元区边缘国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可能得到相似的估计结果：如果双管齐下，资本流动或许可能减少 95%。

图 2 资本账户管制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冲击的估算（%）



注：以上图表表示当流出国对金融信贷流出进行管制、流入国对外币借贷进行管制和流入国与流出国均采用管制时，资本流动规模预计减少的程度，以百分比表示。左图表示金融危机前，2007 年的情况，右图表示金融危机后，2010 年的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到，如果流入国和流出国都进行管制，金融危机之后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可能分别减少 10% 和 90%。总体而言，作者的结果对一系列敏感性检测都很稳健，包括用存量而非流量来定义被解释变量，通过工具变量的方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对现有的资本管制使用了两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量：货币/中央银行自由度以及是否存在民主的左翼政府。

3、溢出效应

如果资本接收国的管制在减少跨境银行资本流入上是有效的，那么他们可以将资本转向流入到同一区域里的其他更为开放的国家。这样的转向流动或许可以为生产性投资融资从而得到欢迎，但也同时会加强已有资本涌入国家现存的扭曲程度，导致成本高昂的“资本管制战争”。

作者的结果表明这种资本流动转向确实是可能的，当流入国的邻国（地理上或经济相似度上）金融相对封闭时，其接收的银行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更大。考虑到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波动性，以及资本管制对其他流入国潜在的溢出效应，作者无法排除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管制措施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更需要流入国进行多边协调。

4、政策启示

首先，考虑到跨境银行流动与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的分析表明在繁荣时期进行相关的资本账户管制可以帮助削弱这些流动的顺周期性，从而减小系统性金融危机风险。

其次，同时对流入国和流出国进行资本管制对流动资本具有良好的限制作用，因此双边协调有助于在双方都相对减少管制程度的情况下达到缩减跨境流动的目的，相比单边管制，这样做更有效率，因为资本管制的成本在税率上是凸性的。而当单边采取行动的作用非常有限时，例如制度脆弱或行政能力不足或国际法律职责限制了管制的有限性，双边协调尤为有益。

再次，流出国货币政策对推动银行资本流向流入国的作用很强，作者的结果也表明货币政策领域的协调至关重要。如果流出国采取逆周期货币政策，其对国内经济的作用可以得到强化，通过采取合适的资本管制相关措施，反向的跨境资本溢出效应也可以得到减少。

最后，考虑到流入相关的资本账户管制溢出效应，作者的研究结果也建议流入国之间采取合作以避免代价昂贵的资本管制战争。

本文原题为“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at both ends”。本文作者 Atish R Ghosh 为 IMF 研究部系统性问题部门的助理主任和主管，Mahvash Saeed Qureshi 为 IMF 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Naotaka Sugawara 为 IMF 研究部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量化宽松的分配效应

Jérémie Cohen-Setto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超低利率和央行的资产购买行为刺激了资产价格，富人是主要的受益者。尽管关于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的讨论已是老调重弹，然而，在不平等性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使用面前，这一话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编译如下：

1、争论的主要来源

Cardiff Garcia 提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的方式已成为争论的主要来源。Olivier Coibion, Yuriy Gorodnichenko, Lorenz Kueng 和 John Silvia 认为，“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打出的“终结美联储”这一口号日益流行，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反映出如下观点的影响力：在扩张性货币政策抬高富人相对收入份额的过程中，美联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越来越多人认为，金融家和他们的高收入客户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 Benoit Coeure 写道，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更支持借款人而非存款人，因此抱怨声越来越大。德国等地甚至将为老年生活储蓄的行为称作“冷征用”。

2、低利率与储蓄者的收入

Paul Krugman 写道：打压利率是压低社会底层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一论断并不准确。消费者财务调查显示，在财富分布中，约 3/4 的财富几乎没有投资收益，位于分布中 75%-90% 的人尚有点投资收益。但是，即便在利率相对较高的 2007 年，投资收益仅占总收入的 1.9%，这对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总体影响微乎其微。

Benoit Coeure 写道，当前，储蓄者的低回报是近期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及欧元区金融市场分裂的结果。央行副行长 Ben Broadbent 在最近的演说中称，对于“自然”或“均衡”利率，央行一直在容纳其更深的下行趋势，而非造成这一趋势。

3、资产价格与不平等

William Cohan 指出，美联储的总资产已从危机前 8 千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增至 4.5 万亿美元。许多证券机构以很高的可盈利价格购买资产，直接向华尔街的交易员付费。美联储也可能为交易员的七位数奖金直接付费了。

Ben Broadbent 写道，货币政策的自动变化会影响资产价格。如果央行决定无来由地任意降低利率，实际资产价格就会上升，不过该影响不会持续很久。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James Bullard 认为，股票价格上升不足以证明量化宽松犯下了加剧不平等的罪过，因为如今的股票估值比 2008、2009 年正常多了。

Paul Krugman 怀疑，关于量化宽松涉及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观点源于如下事实：2010 年来股票价格汹涌上升，住房价格却没有，由于中产阶级家庭在住房上

投入了大量财富，这似乎高度不平衡。我们期望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具有差动效应，然而，这回住房却成了例外，因为 2000 年代中期住房经历了巨大的泡沫，现在无法重新高速发展。同时，2008-2009 年股票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这只是金融混乱和恐慌，即便没有量化宽松，股票也可能会强劲反弹。

4、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的净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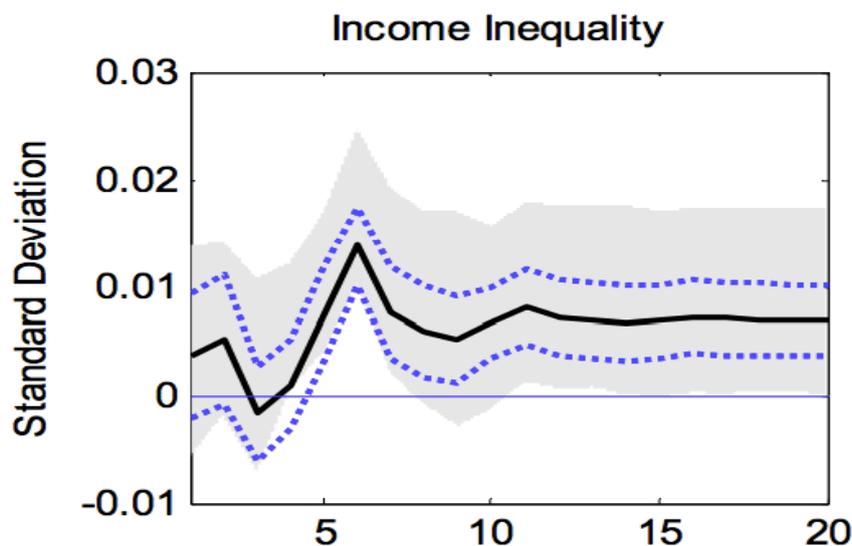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Eric Rosengreen 指出，无疑，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之一，因而持有股票的人将比没有股票的人受益更多。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度量方式。衡量净效应时需注意，政策对借款人的影响远高于贷款人，对失业者的影响远高于就业者。富人大多有工作并倾向于借钱给银行，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人们则倾向于借款。

Jared Bernstein 写道，充分的分析应包括美联储未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时的情况。Olivier Coibion, Yuriy Gorodnichenko, Lorenz Kueng 和 John Silvia 写道，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性的渠道有以下五条：

- 1、收入来源的异方差性（工资对比利润）；
- 2、金融中介及其高收入客户；
- 3、“组合效应”；
- 4、劳动力收入对经济周期反应的异方差性；
- 5、借款者与储蓄者。

尽管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程度的渠道可能相互抵消，上述四位作者发现，1980-2008 年，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确实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性。

图 11980-2008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性变化趋势



Ayako Saiki 和 Jon Frost 考察了日本十年来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社会不平等性的影响。我们的向量自回归结果显示，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性，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更为激进后的情况尤其如此。

Brad DeLong 写道，探究量化宽松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性的意义很难，因为我们并不确定量化宽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它能够通过抬高货币基数的方式，可信地在未来降低名义利率、推高通胀率吗？它能降低有风险资产的供给量，从而降低风险溢价吗？如果前者成立，那么，政府无异于在储蓄者与借款者、已存款者之间强加了财富转移。如果后者成立，那么，政府无异于在风险承担者与将风险推到未来或已承诺承担风险的人之间强加了财富转移。无论何种情况，注定是过去承担了风险或已经储蓄的人成为今天的富人。由此，我们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性有所加剧。

本文原题为“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 of quantitative easing”。本文作者为 U.C. Berkeley 经济系在读博士。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土豪在欧洲掘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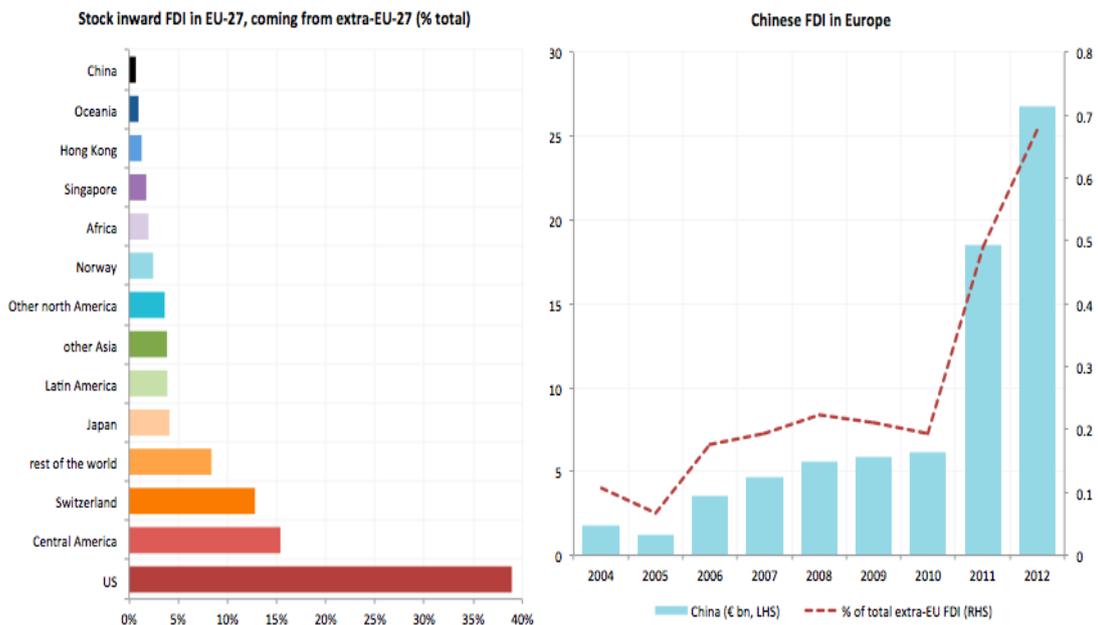
Silvia Merler /文 苏丹/编译

导读：随着 2010 年欧债危机爆发，中国调整了海外投资重点，将重心集中在陷入困境中的欧洲，并利用这种百年一遇的机遇，开始收购世界级的品牌，入股关键性的国家基础设施资产。编译如下：

中国“土豪”企业正大举进军欧洲。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原先投资者纷纷撤资，然而中国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的资金投向遭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欧元区国家。2012 年年底，中国对欧投资存量已增长 4 倍，达到近 270 亿欧元。欧洲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增速最快的目的地。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作欧洲对外投资的接受方。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欧洲国家对中国的 FDI 总额大约占到中国 FDI 存量的 18%。然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额则只占欧洲总量的一个很小的比例。虽然从 2010 年以来，这一数字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总投资额仍然只占欧洲国家 FDI 存量的极少一部分（大约 0.7%）。

图 1. 欧洲地区 FDI 主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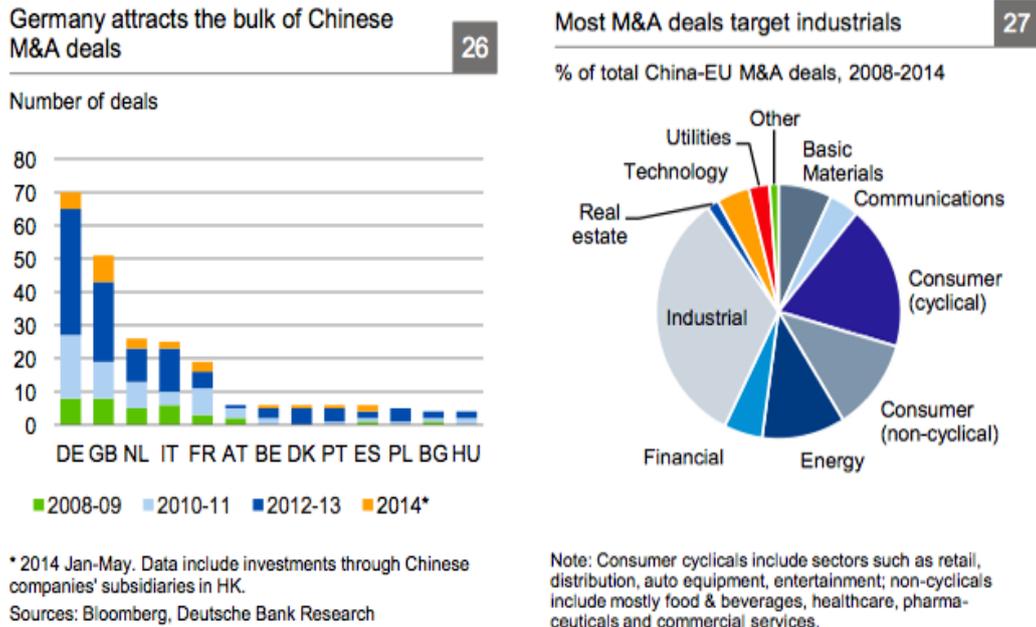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德意志银行

尽管总体比例不高，但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数据，仅在 2008 年至 2014 年中期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就已经完成了超过 200 起对欧洲企业的跨国并购。其中，德国吸引了最多的投资额，其次是英国和荷兰。从 2012 年开始，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变得越来越吸引中国投资者。大多数并购项目集中于工业制造部门、消费品、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领域（如图 2）。此外，

对于不同国家，中国企业投资策略也不相同：对德国，投资的主要流向是可替代能源、自动化零件和机械设备等；对法国，投资的目标主要是消费品生产部门；对英国的投资则比较分散。

图 2. 中国对欧洲投资流向



数据来源：德意志银行

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在欧投资的现代轨迹展开了更深入的调研。事实上，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以及中国投资者的移民策略，都与中国从 1999 年开始实施的“走出去”政策密切相关，目的是发现新市场和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

意大利越来越可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截止到 2012 年底，意大利一共有 195 个中小企业部分或者全部被中国投资者收购。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也收购了很多意大利的大型企业。2014 年上半年中国对意投资更是大幅飙升：7 月 31 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以 21 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公司旗下能源网公司 35% 的股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最大单笔投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已经收购了意大利 3 家最大企业约 2% 的股份，这些企业包括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意大利电信(Telecom Italia)和普睿司曼(Prysmian)。

本文原题为“China seeking to cash in on Europe’s crises”。本文作者为布鲁塞尔智库布勒尔(Bruegel)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6 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策略

K. William Watson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WTO 将不再允许美国在反倾销行动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人们不禁质疑，非经济政策手段将从此悄然消失吗？本文认为，美国的最优选择是尽早废除“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策略，这既符合 WTO 规则，又会降低对本国经济的扭曲效应。编译如下：

按照常规做法，在反倾销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将为某国厂商生产的产品计算“正常价值”，即美国本国生厂商在本国市场收取的价格或根据生产成本核算的“结构价格”，从而确定“倾销边界”。如果外国进口产品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那么为了抵消产品倾销的影响，进口国将会对该产品征收高额附加税。

然而，在一项有关“非市场经济体”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通过量化出口厂商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和材料成本）并采用第三国其他生产者所支付的相应要素价格来近似地表示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对中国进行“非市场经济体”定位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是，美国商务部在权衡是否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无视中国厂商自身的实际成本和国内价格，而是采用估计值。这通常具有惩罚性，并且不符合实际。由此导致，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均承担了较高的成本和不稳定性。

对待来自非市场经济体进口产品的不同态度背后所隐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无稽之谈。如果出口产品价格是由出口国政府任意确定的，那么在常规反倾销调查中对这些价格进行比较就毫无意义。但是，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已不同往日。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亿万百姓摆脱了贫困，并在21世纪初使中国跃居全球经济大国之列。中国实施经济自由化的路径是曲折的，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模式的经济体系。目前，虽然价格管制和公有制在某些产业中仍然存在，但是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已承诺遵守全球经济规则。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的这些变化，未及时把握这些细微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却仍坚定地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在反倾销程序中仍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不合理的歧视性待遇。随着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官方一味地提高对中国经济所必须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的期望。美国政府声称，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体系进行行政干预，因此美国并不一定要遵守WTO有关反倾销的一般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对检查滥用行为并无规定。认为中国情况特殊的观点，只是美国无止境地实施歧视性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

目前的WTO规则允许美国继续采用这一歧视性手段，这也是中国加入WTO

时所答应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将于2016年12月到期。如果超过这一期限，美国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将会严重违反WTO规则。直至目前，美国贸易官员才开始重新考虑在反倾销程序中对美国所采取的歧视性策略。

也许，对于美国来说，只有结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体”的定位才是唯一合法和合理的选择。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美国有权做出选择，即诚心诚意地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抑或固执地坚持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地位的结束对美国是否有利将取决于美国的最终选择。

不幸的是，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不合法历史行为来看，美国不会诚心诚意地接受2016年的最后期限。美国对非市场经济体所采取的反倾销策略经常超越法律和逻辑边界，并已陷入与中国互相滥用反倾销策略的“以牙还牙”诉讼和反诉讼中。如果美国不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那么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体”例外条款的最后期限结束后，有可能激发更严重的冲突。

为此，美国商务部可以采取诸多替代策略予以应对，每种可能的措施将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影响。第一，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美国商务部有权利无视WTO规则的变化，而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他们也可以基本上接受中国的新经济地位，同时继续采取歧视性手段。这两种应对措施都将导致WTO长期的诉讼和反诉讼。

第二，美国商务部可通过其他途径来遵循WTO和美国法律，同时通过公平方式考虑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行政干预。然而，此类方法似乎不能为美国商务部带来当前政策所能带来的高收益。

第三，美国商务部彻底接受中国已完全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的事实，同时放弃“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措施，并通过反补贴法来应对任何残余市场扭曲。这一政策选择不仅会减少不合理和被滥用的反倾销行为，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改善中美关系，增强美国在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的此类替代措施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WTO诉讼的期限，激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进而危害美国经济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健康运行。为促进贸易发展，维护本国公众利益，美国的最优政策选择是在2016年之前彻底结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待遇。在最终截止期限之前，结束“非市场经济体”歧视性待遇，既符合WTO规则，也将有利于增强美国在诉讼频发的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降低反倾销策略对本国经济的扭曲效应。

本文原题为“Will Nonmarket Economy Methodology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U.S. Antidumping Policy toward China after 2016”。本文作者为 Cato 的赫伯特·a·施蒂费尔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贸易政策分析专家。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Cato 短评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DP 误导中美经济实力

Derek M. Scissors / 文 黄懿杰 / 编译

导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做出预测，认为中国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 GDP 规模将在 2014 年超过美国。本文作者分别从购买力平价方法、GDP 指标以及国家财富三个层面驳斥了这一观点。编译如下：

2014 年 4 月和 10 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在头条刊出中国经济规模将于 2014 年超越美国的预测。这些国际机构认为在购买力平价（PPP）的假设下，中国的 GDP 规模将超越美国。但该假设从根本上存在不少问题，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领先中国。

1、PPP 的问题

PPP 的应用始于这样一种情形，即 100 美元在奥地利能买到的东西比在津巴布韦明显要少。因此直接比较两个国家的收入并不恰当，而需要对收入进行调整。但 PPP 的调整方法存在下述问题：

1) 仅仅是构建中国和美国的的价格体系已经是一项浩大工程，因为两国经济规模巨大，内部差异显著。那么，将两国进行比较就更难了；同时这种比较变化多端，也使得“最新”的 PPP 调整效果较差。变化最大的一次发生在 2007 年，世界银行突然把中国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 GDP 削减了 40%。

2) PPP 依赖于“一价定律”，即在任何竞争性市场之间，价格应该相等，因为买方将会找到更便宜的货物，从而将价格推至正常水平。但中国控制了能源、谷物及资本的价格，包括汇率水平；也扭曲了建材及劳动力市场。认为中国是完全价格平价（full price parity）并不正确。

3) PPP 仅仅是用来衡量购买力的，但 GDP 包括了许多与消费无关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中国，GDP 的大头并不是消费。而且，一价定律显然也不适用于中国的政府购买行为。但世界银行和 IMF 将这些活动也应用了 PPP 方法。

2、GDP 也有问题

更严格地来看，GDP 衡量一年特定经济活动的总量，这是衡量经济体的合理指标吗？GDP 是衡量国民收入的会计指标，但不是实际可以花的钱。特别是在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6800 美元，远远超过约 3000 美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此外，GDP 作为一种会计工具，呈现的是结果，而不会导致任何实质变化。

即使是作为一个衡量指标，GDP 也有问题。比如，进口通常对购买方有利，但会减少 GDP 核算。同时，GDP 每年归零，但真正的国民财富会不断累

积。财富的多少会影响消费，因此个人财富的变化才会使得经济出现变化。相比 GDP，财富是衡量经济的更好指标。

3、财富：美国 vs. 中国

美联储每个季度对美国家庭财富进行核算。截至 2014 年 6 月，美国家庭净财富约 79 万亿美元。瑞信（Credit Suisse）同时发布美国和中国的这一指标，其中美国的私人财富为 83.7 万亿美元，中国为 21.4 万亿美元。

此外还有公共财富。美国的公共净财富为负，规模达到 10 万亿美元；中国国家层面的公共财富约 14 万亿美元（2014 年），其他省级公共财富约为 4 万亿美元。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也很高，大约 11 万亿美元，因此中国的公共净财富约为 5 万亿美元。

比较美国和中国，两者的差距不是私人财富差额的 62 万亿美元，而应该是 40-45 万亿美元之间。

4、结论

这么看来，美国不仅还在中国前面，而且是远远领先。不像世界银行和 IMF，中国官方对此非常清醒。2013 年的中共三中全会申明了大规模改革的必要性。市场导向的改革将带来中国财富的又一次提升。

但关键是，把改革的愿景变为有利的行动。这还没有发生，也许是因为反腐行动需要首先完成。但即使改革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不可能重演 15 年前的快速增长。而美国仍将在经济层面占据领头羊的角色。

本文原题为“GDP misleads on China and the US”。本文作者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刊于 AE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反思美国的对“伊斯兰国”战略

Jon B. Alterman /文 杨原/编译

导读：受美国人斩首事件的刺激，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斯兰国”战略开始变得趋于强硬且更加投入。本文的作者对现有战略过度倚重军事手段的做法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并给出了补充性的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尽管奥巴马政府竭尽全力地试图减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策投入，可事实上美国已然深陷其中。两个美国人被斩首的录像促使美国采取全新的政策手段，在军事对抗“伊斯兰国”的策略选择上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不过，尽管美国新采取的政策并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但它所包含的军事内容还是太多了。对该政策重新做出校正是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

两个美国人被“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一事所激发起的仇恨情绪促使美国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但美国及其盟友其实很难纯粹通过军事手段赢得与“伊斯兰国”的斗争。要想击败该组织，还需加强外交、情报以及经济方面的战略努力。除此之外，对付该组织的战略还必须包括意识形态和法律实施等维度的内容，甚至还应包括政治解决的途径。当然，这些非军事性的政策手段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许多手段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显出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赢得胜利：削弱该组织的外部联系，摧毁它的避风港，并使其失去对其潜在招募者的吸引力。

然而，美国未能经受住军事手段的诱惑。毕竟，美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精确而彻底的军事打击能力，而且能够从一个自己很安全的距离实施这种打击。不仅如此，这种军事能力由美国人自己所操控，做出决定和发起行动之间有时仅仅只间隔数小时的时间。军事打击的确显得非常有魄力，能够让人产生满足感。

但问题是，“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极端组织，肯定非常乐于与一个超级大国相对抗。在该组织成员看来，上个月的斩首行为所营造出的形象是非常完美的：他们能够像杀猪宰羊一般地任意屠杀美国人。这就向外部世界营造出了一种虚幻的景象，即“伊斯兰国”拥有匪夷所思的能量和权势。这种幻象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伊斯兰国”是其自我形象的“编辑者”。他们只向外界宣传其成功的事件，而隐瞒其失败的经历，掩饰其在战场上所遭遇的挫败，并在其精心筛选的画面中隐去他们日常生活环境的肮脏和混乱。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应是彻底改变其战略方向，而是对现有战略做出校正。首先，更清晰地界定其战略目标，即迫使“伊斯兰国”从内部垮台，而不是在战场上击败它。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伊拉克

和叙利亚境内的流血冲突，并促成对这些冲突的政治解决。因为“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得到逊尼派教徒的支持，就是因为这些教徒认为他们受到了迫害和背叛，并因此而感到恐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教徒都害怕遭到屠杀，而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由于害怕自己被屠杀，因而会认为屠杀他人是正当的。如此一来，有人就可能会对“伊斯兰国”产生同情，对其受到逊尼派的支持表示“理解”。然而这种同情和理解完全是“不必要的”。要想动摇逊尼派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需要为数百万逊尼派教徒（包括那些曾经主动或被动地为“伊斯兰国”提供过支持的教徒）提供安全保护，并设法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而这或许越发需要采取与军事行动相反的政策。

其次，建立更具效率的统一阵线，让盟友与美国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加明确当前由美国所领导的对抗行动最终所要实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同时还要明确在实现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每个盟国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奥巴马政府似乎想要同时承担多种任务，但这些任务往往本质上都是军事性的而且彼此之间并不能协调得非常好。而事实上，军事任务仅仅只应是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对于盟国们来说，许多无形的任务，比如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乃至所有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失去合法性，同样至关重要。

第三，确保受美国支持的“伊斯兰国”内部的反叛者扮演恰当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装备的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展示美国介入伊拉克局势的决心，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表现得似乎对伊拉克局势不太关心。由于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不愿介入，因此导致美国现在很难动员其他国家介入。此外，还应让反叛者和其他盟友明确反叛者的目标应当是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赢得完全的胜利，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美国应当让反叛者们组成一个集体，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信誉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

此外，美国还应怀有更大的远见，即考虑美国如何能够利于这次冲突来改善其与本地区另外两个敌对者伊朗和叙利亚的相对位置。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不应迎合任何一个派系，不应为达成合作而做出让步。但与此同时，可以利用反对“伊斯兰国”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尝试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更为积极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方对各自最终所试图实现的状态有更清楚的认识。

总之，尽管奥巴马政府现在应对“伊斯兰国”的战略并不仅仅是军事性的战略，但很显然是以军事为重中之重的。奥巴马有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演讲核心谈论的是军事手段，而且使用的是军方的语言，两次许诺要“瓦解和摧毁”“伊斯

兰国”。奥巴马这么做有可能是想突显此次斩首事件的紧迫性，而只有动用军事手段才能够体现出足够的紧迫性。然而，正如马丁·登普西将军在参议院演讲时所暗示的那样，美国的这些军事手段很可能会招致敌人更多的军事行动。美国所拥有的军事手段用来打仗绰绰有余，但用以赢得胜利却还远远不够。

本文原题为“Rethinking Strategy toward the Islamic State”。本文作者乔恩·奥尔特曼（Jon B. Alterman）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中东项目主管。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发表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11 月亚太地区国际峰会政策前瞻

Murray Hiebert, Gregory B. Poling /文 杨原/编译

导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峰会将于 11 月在亚太地区集中召开。这些峰会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何意义，奥巴马将如何利用参加这些峰会的机会来推动其亚太外交政策，本文的两位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判。编译如下：

11 月 4 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将赴亚太参加一系列重要国际峰会。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正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的当下，参加这些峰会无疑是奥巴马应对和解决这些挑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奥巴马亚太行的第一站将是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APEC 会议），随后，他将于 13 至 14 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参加东亚峰会。在他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 15 至 16 日在那里举行的 20 国领导人峰会以前，前两个峰会是奥巴马进一步推动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很好的机会。

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会谈尚未取得更多的进展，因此贸易和投资依然是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TPP 谈判之所以陷入停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本不愿降低 5 种关键农产品的关税。奥巴马在 APEC 会议和东亚峰会上与安倍晋三会谈时，将有机会与其讨论日本参与 TPP 谈判时安倍曾向日本国内承诺的勇气和远见。

东亚峰会各国领导人将要面对的最大的安全方面的议题无疑是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同样都属于再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投入要比经济领域的好得多，而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核心投入就是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富前瞻性。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均已开始不断呼吁有关各方明确表达他们的利益关切及其法理依据。与此同时，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

（Michael Fuchs）在今年 7 月又提出一项新的建议，提议南海各声索国在争议地区停止各种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包括停止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这项建议很快得到菲律宾的响应，但遭到中国的拒绝。

对于上述两种举措，奥巴马应当在峰会中明确表达其坚定的支持立场，并重申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南海争端必须依据国际法加以管理和解决，绝不应诉诸武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巴马应当敦促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东盟的声索国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以明确阐述自己的立场，并

就哪些水域存在争议达成彼此均能接受的共识，进而在这些水域停止一切基建和挑衅行为，以此应对中国改变相关岛礁状态的举动。

除了出席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东亚峰会以及同期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之外，奥巴马同时也很期待与缅甸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如同他 2012 年第一次访问缅甸时一样，此次奥巴马同样有可能对缅甸自 2011 年启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但他同时也会敦促缅甸领导人继续努力并努力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奥巴马需要与缅甸总统吴登盛（Thein Sein）及其他缅甸领导人讨论 2015 年 11 月的缅甸议会选举问题。对于美国决策者们而言，特别是对美国国会而言，议会选举将是衡量缅甸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目前看来，缅甸议会修改宪法第 59f 条和第 436 条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前者使得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因其子是外国人而无法当选总统，后者则为军方保留了 1/4 的议会席位。明年的缅甸选举不大可能非常完美，其选举过程的自由程度和公平程度将决定美国 2016 年及其后与缅甸接触的程度。此外，奥巴马还有可能为缅甸各党派及选举筹备委员会提供其他方面的援助。

其次，奥巴马应当敦促缅甸领导层重建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内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机制为缅甸若开邦的洛兴雅穆斯林提供援助。2012 年若开邦发生的种族宗教冲突导致 14 万洛兴雅难民被隔离在难民营。今年 3 月，救援人员被驱逐出若开邦，然而此后缅甸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解决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在外国医疗人员被驱逐出境后，当地难民已经无法获得有效的医疗救护。

再次，奥巴马将会提醒缅甸领导人，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缅甸政府与国内武装族群间的和平谈判。今年 8 月，族群领导人对通过对话实现问题解决的前景还相当乐观，但随后他们发现，缅甸政府谈判团中的军方成员在 9 月的会谈中又收回了一些他们此前做出的承诺。与国内族群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将严重制约缅甸的经济发展。奥巴马应当对缅甸的和平进程提供最强有力的外交支持，保证一旦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将为难民安置和经济建设提供援助。

本文原题为“Summits Provide Obama Venues for Addressing Asia Challenges”。本文作者默里·希尔伯特（Murray Hiebert）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苏米特罗东南亚研究项目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B. Poling）是该中心苏米特罗东南亚研究及太平洋伙伴计划项目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于 Southeast Asia from Scott Circle。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

高歌/编译

导读：2014年10月8日，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网站上发表题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的文章，文章对10月8日发布的关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强调了加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编译如下：

在2013年10月的2+2会议上，美日两国国防部长提议对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这次日美修订同盟条约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日两国2014年10月8日共同发表了进行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的中期报告。修订后的指针计划年底出台，通过该指针，美日之间将建立更加广泛和灵活的同盟合作框架，其目的在于保证日本在任何情况下的和平与安全——无论是平时或是在突发状况中——同时促进亚太乃至更多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

美日之间的双边同盟不仅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同时也是全球合作的平台。美日之间的安全合作建立在坚定不移地保障日本安全的基础上，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几乎包含了防卫政策和行动的所有方面。

一个动态的世界要求一个动态的联盟，修订后的防卫合作指针将会更加现代化从而适应今后数十年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通过新的框架，美日同盟将会更加平衡、有效。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国与日本讨论了两国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应该承担的任务，基于此次修订，双方对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 无缝且高效地进行全政府范围的联盟协调。
- 采取措施防止日本安全状况的恶化。
- 加强双边合作从而形成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 在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以同盟形式进行合作。
- 以及时有效的方式互相支持。

为确保日本防卫的坚固性，修订后的指针将加强两国与区域外大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重要事务上进行合作的权力，例如人道主义援助、能力建构等。作为伙伴和盟友，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从而提升区域和平。为此，美日双方都将努力促进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获得理解。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届任期中，我们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展望和部署，为实现这一战略，应当向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与综合的双边条约相一致的资源。而与日本同盟关系的加强正是在行动上支持了这一政策。

本文原题为“Interim Report on the Revision of 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本文刊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的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官网。 [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7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9名。

网址：www.aei.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 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 <http://csis.org/>